

## 張冲與國民黨電影宣傳事業(1934-1936)

林威杰\*

電影作為一門藝術，從誕生之初就被介紹到中國來，也就是說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幾乎與世界是同步的。電影的影響力可謂是全面性，從人們的食衣住行育樂，無不一與電影息息相關。同樣的，1930 年代，國民政府為統治上需求，以及面對來左翼電影的挑戰，因此積極的從事電影宣傳教育。張冲，就成為中國電影承先啟後的一個重要角色。當時主掌國民黨宣傳系統的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極力扶植張冲進入電影宣傳體系，希望運用張冲專長，來了解各國電影發展現狀，進一步促進中國電影事業，也寄望張冲特務出身的背景，以便於反共宣傳的運作，打擊與查禁那些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影片。整體而言，張冲主持中國電影事業發展的時間不算長，但在他任期內，中國電影走出國門迎向國際，讓世人看見中國，奠定了未來中國電影事業的基礎。

關鍵詞：張冲、電影教育、胡蝶、漁光曲

---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 一、前言

張冲，1904年生於浙江省樂清縣。他早年加入國民黨，得到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器重，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一職，主持情報工作，同時也是「伍豪脫黨事件」的策劃者。張冲受到蔣介石的重視，曾參與中蘇協商、國共談判等重要事件。有關張冲對中國電影發展與電影教育的貢獻，後人曾給其一段極高的評價：「張冲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他做過很多實實在在的事，對於中國電影歷史的寶庫，中國電影教育歷史的寶庫，他是第一號鑰匙。不真正的了解張冲，就無法真正了解中國電影的歷史和中國電影教育的歷史。」<sup>1</sup>本文嘗試利用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檔案為主軸，配合其他相關文獻來討論中國電影事業發展與張冲的淵源，深入去了解他在其中的貢獻。

## 二、中國國民黨電影宣傳事業的萌芽

當時電影被稱為第八藝術，<sup>2</sup>除了於娛樂觀眾之外，同時還兼負宣傳、教育等的功能。<sup>3</sup>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執掌全國的執政權，蔣介石對於文化教育部分相當重視，其中特別「注意電影」<sup>4</sup>，於是交由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負責。陳立夫希望透過宣傳的方式，來讓一般民眾了解政府的政策，以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力。第一步首先在南京成立當時東亞最大的廣播電台，其次是製作與國民政府有關的影片，加以推廣到偏遠地區。<sup>5</sup>起初陳立夫計畫建立一個電影攝影棚，但由於經費的缺乏，以致遲遲未能實現。對此，他提到：

---

<sup>1</sup> 孫健三，〈開啟中國電影史與中國電影教育史絢麗寶庫的第一號鑰匙〉，《北京電影學院學報》Z1(2015.10): 66。

<sup>2</sup> 這八種藝術分別為：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電影。

<sup>3</sup> 塞燕，〈電影簡史〉，《時代電影》2.6(1937.05): 25。

<sup>4</sup> 「潘公展電蔣中正請立令電檢會撤銷大光明影戲院准映執照禁映生活影片及國際大秘密兩片」(1935年1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201-131。

<sup>5</sup>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154。

雖然拍攝電影是一件非常費時間和金錢的工作，不過我們還是引進了中國奧斯卡獎勵制度。而組成一個電影教育協會，提供年度獎金頒給每年在教育內容及意義上最傑出的三部片子，因為，既然我們自己缺乏經費去製片，也只有鼓勵民營影片的製作了。<sup>6</sup>

1920年代中期，電影放映已普及於中國各大城市，其影響力受到世人與當局者所關注。<sup>7</sup>1928年，由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組建一個當時中國最高的電影教育中心，但中國電影真正步入軌道的是在1930年代，此一階段人才輩出，為今日中國電影紮下不少根基，同時1930年電影從無聲進入有聲，跨入一個新的紀元。<sup>8</sup>當然，這些電影其中不乏需多有礙於當局統治的影片，或是充滿左翼色彩的電影，因此為有效管理電影工作，國民政府於1929年7月1日頒布了「電影片檢查規則」來規範相關事宜。<sup>9</sup>其中規則的第一條便規定「凡電影片，無論本國製或外國製，非依本規則經驗查核准後，不得放映」，凡是有違背三民主義或是反對政府之影片，更是檢查的重點。<sup>10</sup>國民黨當局期望利用電影，來做一個總發動機，使各種政府的計畫深入到人民心裡，讓民眾感到需要，如此對於三民主義的推行，有極大助益。因為電影可以用來彌補教科書的不足，也可以將國外先進的技術介紹到中國來，甚至更喊出「利用電影，是目前救國之道」。<sup>11</sup>法令的制定是為了改善當時電影界素質良莠不齊的狀況，避免使民眾受到不良的影響，更透過電影傳達先進的思想，希望藉此將中國一切封建迷信的思想革除。<sup>12</sup>讓那些描寫中國

<sup>6</sup>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155。

<sup>7</sup> 汪朝光，《影藝的政治——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21。

<sup>8</sup> 徐耀新主編，《南京文化志》，下冊（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3），507；司馬芬，《中國電影五十年》（臺北：皇鼎文化出版社，1983），6-7。

<sup>9</sup> 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第1卷，175；「電影片檢查規則」（1929年4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00-0002。

<sup>10</sup> 「電影片檢查規則」（1929年4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00-0002。

<sup>11</sup> 褚民誼，《利用電影促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及輔助各種事業之進行》（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7。

<sup>12</sup> 盛澤，〈我國最近之電影審查條例〉，收入盧夢殊編，《電影與文藝（銀星號外）》（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1928），94-95。

人「醜陋、惡劣、齷齪、下流」的影片，或是那些將女子敘述為「罪惡的淵藪、視為不潔、視為蛇蠍等一切荒謬電影，非由政府延請藝術專家出來嚴格取締不可」。<sup>13</sup>最終希望「把那些充滿著淫靡、妖豔、肉感等等宣傳罪惡的片子，掃一掃乾淨不可。」<sup>14</sup>但電影檢查制度也讓中國電影發展有著一定程度的阻礙，使電影成為某些特定政黨的宣傳工具，扼殺了電影創作自由發揮的空間。另一方面蔣介石本人相當重視電影教育，他指示陳果夫：

電影教育重要，應即著手。前電賀衷寒同志之外，尚有數點須補述者：一、電影劇最初開幕，必須將全球各國地圖與中國固有國界及東北地圖、朝鮮、臺灣、琉球地圖各一幅，並加以各失地時期歷史之說明，最好用軍校大禮堂教科之法影演之。二、岳武穆之精忠報國，文天祥之正氣謀國，史可法之殉難遺書，以及關公、班超等可為軍人與民族模範各劇，亦另多編。三、各國亡國慘劇，以及亡國後身為亡國奴之苦痛，應描寫盡致，亦編為一劇，中決籌十萬元為基金，為徵募影據與電影場之基金，如不足則可另籌，請與賀同志積極進行。中正。皓機。<sup>15</sup>

對電影陳感到：「看教育電影，不可當戲看，應該當書看。好書看不厭，電影看不倦，教育力量更無限！消解我煩悶，增長我智識，補充我不易得到的經驗。」<sup>16</sup>所謂的電影教育是，「凡電影片之能增加人民政治、社會、藝術及技術等智是指，皆得稱謂教育電影片」。<sup>17</sup>也就是以電影藝術的本身，「利用一個有趣動人的故事，一方面報告那觀眾以事實，一方面組織觀眾的情感，領導他們對於某某人事應有某種見解，應取某種態度的」。<sup>18</sup>當時中國人在國劇、國樂和電影的議題上，傳統上有一種偏見，認為只是小道，不

<sup>13</sup> 復生，〈腐化與惡化〉，收入盧夢殊編，《電影與文藝(銀星號外)》，111。

<sup>14</sup> 陳立夫講述、王平陵筆記，《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30。

<sup>15</sup> 〈蔣委員長致陳果夫指示電影教育要點電〉(1933年4月1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435。

<sup>16</sup> 陳果夫，〈教育電影序幕〉(1935年)，收入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臺北：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9)，187。

<sup>17</sup> 薩爾地，《電影與中國》(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9。

<sup>18</sup> 洪深，《電影界的新生活》(南京：正中書局，1934)，8。

足以登大雅之堂，而對電影明星等演藝工作人員，更有一種鄙視的態度，稱之為「戲子」。陳果夫感到相當不以為然，為扭轉這個觀念，認為這是文化工作最重要的任務，當前需加強對電影與戲劇的提倡，尤其是電影事業。陳果夫建議蔣介石，提出希望黨內領導幹部能以身作則，擔任電影演員，以協助影片拍攝。據方治的回憶：「不知經過誰的推薦和選擇，竟然找了張道藩同我濫竽充數電影演員一角，於是我們兩人都以中央委員身份演了一部反軍閥電影叫『密電碼』。」這部影片拍攝十分成功，獲得廣大迴響，使得蔣介石十分開心，下令加強對社會的宣傳介紹，以提高影藝工作者的地位。除了有拍攝優良影片外，宣傳工作更是陳果夫相當重視的，他曾說過：「作宣傳不能說謊，要確實，一次說謊，下次別人就不信你的話！宣傳工作必須拿出真憑實據，使人心悅而誠服，千萬不要花言巧語，危言聳聽，蒙騙大眾」。<sup>19</sup>同時陳認為教育、宣傳與電影三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 1933 年國軍對紅軍進行圍剿的時刻，陳果夫就曾指示利用流動電影來對蘇區民眾進行反共宣傳教育。<sup>20</sup>其實關於利用電影來對民眾進行反共教育一事，早在國民黨取得全國執政權之初就已經開始。1931 年 6 月 10 日，國民黨第三屆常務會議就曾決議通過，「派員赴贛鄂匪區域攝製電影片，以暴露共匪罪惡」。<sup>21</sup>希望利用對中共的負面宣傳影片，來讓國人了解共產主義對中國的危害，增強當局剿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 三、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

1932 年國際聯盟為了促進世界文化的進展，認為電影在教育上，是成果最顯著的工具，因此通令各會員國組織教育電影協會。<sup>22</sup>身為會員國之一的中國，自然不能自身其外，於是由陳立夫、朱家驊、葉楚傖、郭有守及羅

<sup>19</sup> 方治，〈與果夫先生的奇遇及其他〉，《傳記文學》29.3(1976.09): 28。

<sup>20</sup> 陳果夫，〈看電影〉(1944年)，收入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188-189。

<sup>21</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員赴贛鄂匪區域攝製電影片請撥款案〉(1931年06月08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3.3/168.8。

<sup>22</sup> 方治，〈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的使命〉，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5。

家倫等五十餘人發起成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是年的7月8日，在南京教育部召開成立大會，該協會成為當時中國最高電影指導機關之一。<sup>23</sup>工作最主要宗旨是發展國內教育電影，利用教育電影肅清中國的文盲，以提升國人整體文化水平。<sup>24</sup>陳立夫提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應負的使命：「應該從積極方面努力，鼓勵甚或設法資助中國有希望的影業家，提高他們的趣味，充實他們的內容，凡已成功地做，要加以改良，同時，並宜集合群力，創造不違背中國歷史精神和適應於現代中國環境的作品，滿足現代中國人的需要。」<sup>25</sup>並且他也為中國電影未來應走的新路線設計規劃如以下幾點：「一、發揚民族精神；二、鼓勵生產建設；三、灌輸科學知識；四、發揚革命精神；五、建立國民道德。」<sup>26</sup>陳立夫這幾句話，不論在放在當時，抑或這是當今中國電影發展，仍是國產電影相當重要的核心價值。1933年9月22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二屆第四次常務委員會議通過的會務報告中指出：「當國家已窮弱到極致，電影就應指導以救貧圖強之道路」。<sup>27</sup>認為當前中國有「窮、弱、愚、私、亂」等五大問題，但這些問題中充滿了電影材料，電影界可以利用題材來製作，以警惕國人的憂患意識。<sup>28</sup>當時主掌中國教育電影的幾位領導人，相當推崇蘇聯、義大利與德國等國家以政府之力來發展本國的電影事業，其中蘇聯政府對於電影支持，更占每年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七；德國希特勒更將發展電影定為國策之一，相較與此，中國則略顯不足。<sup>29</sup>該次會議也決議編纂《中國電影年鑑》，由陳立夫、王平陵、戴策、潘公展、厲家祥、李景泌、張常人為編纂委員會委員，陳立夫任主任委

<sup>23</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 編印，《二十一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1-2。

<sup>24</sup> 方治，〈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的使命〉，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6。

<sup>25</sup> 陳立夫講述、王平陵筆記，《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2。

<sup>26</sup> 陳立夫講述、王平陵筆記，《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3-29。

<sup>27</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電影事業之出路》（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1。

<sup>28</sup> 褚民誼，《利用電影促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及輔助各種事業之進行》，10。

<sup>29</sup> 郭有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史〉，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編、北京市市屬市管高校電影學研究創新團隊 整理，《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影印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1017。

員。<sup>30</sup>這本《中國電影年鑑》於1934年12月正式出版，由正中書局發售，共印二千冊，是中國第一本官方出版的電影年鑑，內容相當包含極為廣泛、詳實，學術價值強。<sup>31</sup>《中國電影年鑑》頁數達一千多頁，在體例架構上，為後世中國電影研究奠定了學科分類與方向分類，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在學術研究上基本成型，同時也確立了電影史論、創作理論、電影管理和電影教育的四個學術基本架構；在內容上則編入中國與世界各國電影的歷史、理論及教育，並將各國電影政策與機構作一番介紹，還收錄當時全國各大戲院、製片公司及電影從業人員的名錄，可謂是當時一部關於電影的百科全書。<sup>32</sup>

#### 四、初入電影事業

其實張冲開始涉入電影事業應該是在1934年前後左右，期間他奉命出訪歐洲，前往考察各國的政治文化建設，其中以德國、義大利及土耳其三個國家為重點。特別是德國希特勒納粹黨與義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黨的活躍，一直是國人所關注的對象。張冲更藉由此次機會，開始熟悉國際電影事業的現狀與發展。此次陪伴張冲一起出訪的有張北海、羅學濂與許紹楙等人，而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張冲在電影事業中的重要助手。這次的歐洲考察，張冲遊歷義大利、土耳其、德國、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家。在義大利期間更拜會當時首相墨索里尼，對其樸實作風感到印相深刻，也對義大利法西斯黨的組織架構、統治方法感到推崇。<sup>33</sup>據朱開來的回憶：

<sup>30</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二屆第四次常務會議〉(1933年9月22日)，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二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4)，56-57。

<sup>31</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三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28-31。

<sup>32</sup> 張會軍，〈《中國電影年鑑》序〉，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北京市市屬市管高校電影學研究創新團隊整理，《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影印本)》，1。

<sup>33</sup> 張冲認為：「自從墨索里尼領導法西斯黨奪取羅馬的政權成功之後，他就先組織黨的糾察隊，分佈全國各海港，鐵路，山林要隘，以及各交通機關等處，嚴密維持國內治安，以造成著手革命建設的機會。所以義大利能在今日國際的政治地位上站著重要的一席，而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這就是因為墨索里尼當時能充分運用這種組

民國二十三年春，張冲奉命赴德義考察。當時，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候，多少亦影響了國內極少數人的心態。在羅馬，張冲單獨會見了當時的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該年冬回國後，有次南京金陵大學陳裕光校長曾邀請張冲在總理紀念週上報告考察德義的觀感。筆者曾陪去擔任紀錄。張冲在報告中曾簡單的提到他會見墨索里尼的情形。墨索里尼的辦公室很大，但陳設卻極其簡單，只有一張大辦公桌，兩把椅子。張冲就坐在辦公桌對面，和墨索里尼對談，沒有翻譯。談話內容卻沒有透露。筆者曾將演講詞記錄下來，整理後在南京某刊物發表。<sup>34</sup>

如同上述回憶，張冲於1934年12月10日的總理紀念週，在金陵大學演講此次考察心得，演講詞發表在1935年1月25日出版的《晨熹旬刊》上。<sup>35</sup>此次的旅程中，張冲看到各國政黨對青年教育的重視，例如「俄之組織共產黨青年團，意大利之組織巴里拉，少女團，及青年女子團；德國之組織希特勒青年隊等，對於青年訓練，均已收穫良好成績。」因此，他建議國民黨中央應重視青年訓練工作，「組織中國國民黨青年團，使全國所有童子軍及學生軍均集於本黨領導之下奉行主義，而造成中國國民黨新生命。」<sup>36</sup>返國後的張冲十分忙碌，在他給前岳父高性樸的信件中提到：「冲已回國，趕製報告，藉此覆命。日來在各處演講，殊鮮暇晷，致未能作長函報告，引以為疚。」<sup>37</sup>的確，張冲等人此刻正在撰寫本次考察間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心

織的緣故。」張冲講述、以防記錄，〈意德印象的一班〉，《晨熹旬刊》創刊號(1935.01): 8-11。

<sup>34</sup> 朱開來，〈悲劇時代英雄：神秘人物張冲(一)〉，《中外雜誌》42.5(1987.11): 109。關於墨索里尼的敘述，張冲提到：「就他為人的態度而說，也是異常忠厚的，誠懇的。驟看上去！就像是剛從鄉下進城來的農人一般，皮膚非常焦黑。但他對於任何人都是開誠佈公的，不用什麼手腕。所以人家都敬重他，不願欺騙他，樂為他用。因此，兄弟覺到一個政治家的成功，是在於他的忠厚誠懇，和平，絕不是用手腕所可達到的。」張冲講述、以防記錄，〈意德印象的一班〉，《晨熹旬刊》: 8-11。

<sup>35</sup> 張冲講述、以防記錄，〈意德印象的一班〉: 8-11。

<sup>36</sup> 張冲等六委員，〈訓練黨的青年案〉(1935年12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5.2/10.10。

<sup>37</sup> 張冲，〈張冲給高性樸的信件〉(1934年10月19日)，《樂清文史資料》，第4輯(樂清：樂清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108。



得，完成後交付上級批閱，受到陳立夫的讚賞。爾後又將此次報告定名為《意德土訪問錄》，於1935年9月由正中書局出版。內容將義大利、德國與土耳其三國的黨政軍組織作一番介紹，其中又專門以的篇幅，一節來談論義大利與德國的電影事業的統制問題。張冲先是談到宣傳問題，認為宣傳可分為改革、施政、生產與國際宣傳四種，而電影是各種宣傳工具中最普遍及效果最大的一種，政府可加以強化利用。改革、施政與生產宣傳的模式，並在各地撥放相關影片，如此可以提高國人對政府的向心力，與對國家整體發展的信心，在最後總和上述三種宣傳模式，「由政府設計或指導各電影公司工作，其出品優良者由政府加以獎勵或予以津貼。擇優輸送國外或與各國電影公司訂立交換契約，使外人對於我國之實際情形得到更深刻更正確之認識，無形中實足提高我國之國際地位，亦即為國際宣傳」。他也談到中國可效法義、德兩國政府對宣傳組織的運用模式，與新聞政策推行之手段，嚴格審查出版影片，將電影事業納入政府所掌握，凡有危害黨國發展的行為，則一律嚴懲不怠。<sup>38</sup>綜觀這份報告，張冲等人透過這次考察活動，看到義、德、土三國的發展模式，希望藉此來反思當時中國現況。開拓整體視野觀，亦可清晰看出他們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願景，這對張冲返國後執掌中國電影事業，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國民黨政府為加強電影事業發展，於1933年10月成立中央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由陳果夫、陳立夫與賀衷寒等人任委員，方治任秘書，每月撥款二千元充作特別預算，此委員會成為當時中國電影事業最高決策機構。<sup>39</sup>後中央電影指委會秘書方治請辭獲准，其職位由張冲兼任。<sup>40</sup>而張冲係在此一際遇之下，轉入中國電影事業發展。1934年10月24日原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文藝科電影股總幹事黃英病故，其遺缺由張冲繼任。<sup>41</sup>早在

<sup>38</sup> 張冲、張北海、羅榮濂、許紹棣，《意德土訪問錄》，上冊(南京：正中書局，1935)，208-213。

<sup>39</sup> 「方治致蔣介石渝電」(1933年10月7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五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126-035。

<sup>40</sup> 「電影行政人員調動」，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上海：上海電聲週刊社，1936)，217。

<sup>41</sup> 杜雲之，《中國電影史》，第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128。

黃英病危時，張冲就在陳果夫推薦下，<sup>42</sup>臨危授命接任電影股總幹事一職，但這卻讓張冲母親十分不諒解，認為：「為什麼好好的官不做，而要幹電影這勞什子。」但張冲不為此感到動搖，毅然決然地投入電影事業。1934年9月下旬時，甫接下總幹事一職的張冲，就在隨即在宴請上海電影界著名人物，當日到場者，皆為當時中國電影圈重量級角色，如明星電影公司的周劍雲、鄭正秋、程步高、徐欣夫；聯華電影公司的吳邦藩、孫瑜、費穆、金擎宇；藝華電影公司的李春棠、史東山、卜萬蒼、周克、方沛霖；天衣電影公司的邵邨人、高梨痕，及許多黃英舊部等人。席間先由張冲下屬余仲英將張冲先作一番介紹，接著由張冲上台致詞：

中央攝影場與各影片公司絕沒有什麼衝突，它專播黨的光榮歷史，或政治的紀錄等作品，這些大都民間的公司不太愛攝製的。至於我們的敵人，則絕非甲公司或乙公司，而是舶來片。我們希望有一天能使外片絕跡於國內市場。

從談話中可以看出，張冲對振興中國電影事業，有著相當宏大的理想與抱負。與此同時，張冲更進一步將未來電影拍攝內容作一番規範，他認為影片中「不妨描寫窮人，若是專拍富者享樂生活，也會令人感到厭膩，同樣的，也無須得以窮人的描寫為唯一題材」，希望將電片多元化，觸角能深入社會各個階層。他也坦承說：「以前只當幹電影的都是愛玩兒的人們，今日一見，才知道前觀念是錯誤了」。<sup>43</sup>不久，張冲又在11月25日晚大舉宴客，受邀諸人皆為電影界數一數二的人物，及中央電影攝影場各位顧問，此次的邀宴讓與會人士感到張冲積極聯絡電影圈的誠意，與政府振興國產電影的企圖，因此這次的赴宴，讓大家感到「有相當重要的意義」。<sup>44</sup>張冲在對電影圈人士打過招呼後，便開始全面清查全國各地的電影公司，對於那些「神怪荒誕影片之流行，足以影響社會教育，為害最深」的影片加強取締。這些影片，「其內容既極淺薄，而所演之故事，又不外取諸坊肆無聊說部，

<sup>42</sup> 方治於1976年8月，在臺北舉行的「陳果夫先生座談會」中發言提到：「以後他要中委張冲先生來主持中央電影製片廠，更使中國電影有一番欣欣向榮的新氣象，這也是陳果夫先生一種了不起的貢獻。」方治，〈與果夫先生的奇遇及其他〉：28。

<sup>43</sup> 泊泊，〈張冲宴請電影界希望外片絕跡於國內〉，《電聲(上海)》3.47(1934.09)：931。

<sup>44</sup> 〈短訊：張冲大宴顧問先生〉，《影画》1.19(1934.12)：434。

不提倡迷信，既屬誨盜之表演，設不加以取締，任其流毒社會，麻痺人民心理，實非所宜。」1935年1月初時，張冲便帶著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人員，並商請上海市公安局派出特務股的警務人員，協助搜查上海各大電影公司，當場查獲違法禁片，及攝影機件等，並拘留相關人員。<sup>45</sup>其中涉及共產主義內容的影片，更是查禁重點，例如1月19日，上海大光明戲院即將上映的生活影片，內容宣傳共產主義，且「現映國際大秘密一片，中有共黨國際歌及少年先鋒歌，亦未刪剪，殊為不妥」，大光明戲院就遭蔣介石下令「撤銷執照，禁止放映」。<sup>46</sup>如此大規模的查禁違禁影片的氛圍下，張冲此舉無異給了電影圈一個下馬威，使他自己電影圈內立下一定程度的威嚴，替往後政府方便掌控國內電影事業發展，定下了基礎。是年，2月27日中國文化建設協會<sup>47</sup>南京分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張冲又被推舉為電影事業委員會主任，副主任郭有守。<sup>48</sup>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組織目標主要是以三民主義來對抗一切普羅文化，黨治色彩濃厚，利用社會上高知識份子，如大學校長、教授和中小學老師及新聞界出版作家等人，來掀起一場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截至抗戰爆發前，該會是當時全國會員人數最多，聲望最大的文化團體。<sup>49</sup>4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166次常務會議，會議通過將原有電影股升格為電影科，由張冲任該科科長，報告指出：「所有科長

<sup>45</sup> 「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羅剛呈中央宣傳委員會為清查神怪禁片及擬定處置辦法呈文」(1935年1月17日)，《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2.1(1935.02): 4-5。

<sup>46</sup> 「潘公展電蔣中正請立令電檢會撤銷大光明影戲院准映執照禁映生活影片及國際大秘密兩片」(1935年1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201-131。

<sup>47</sup>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創立，乃是由陳立夫、吳鐵城、葉楚傖、陳布雷與潘公展等人，於1934年3月25日在上海組織成立。創建緣起因是認為國家政治經濟的改造，不能與文化脫鉤，然文化建設卻是當前所最欠缺的，因此為弘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精神，希望在文化運動中組織統一戰線來團結對外。並大力提倡須以民族利益為依歸，「絕對唾棄摧殘民族自信，妨礙民族團結，阻害民族向上的一切著述與出版物」。〈本會創立緣起〉、〈本會理論綱領〉、〈本會籌備及成立之經過〉，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念冊》(上海：中國文化建設協會，1937)，7-11、1-2。

<sup>48</sup> 〈南京分會工作報告〉，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念冊》，108。

<sup>49</sup>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北京：華文出版社，2015)，283-285。

一職，查有原任電影股總幹事張冲同志，對於電影宣傳工作，夙富經驗，自主持該股事務以來，一切擘畫，悉中機宜，成績斐然。」<sup>50</sup>議案中指出此次電影股改組原因：

查電影為推進現實宣傳工作，及輔導民眾教育最優良之工具。歐美各國無不竭力追求於一國家電影事業之經營與控制，如現今德、義、蘇俄等國，甚至以此為實現政治主張之唯一宣傳工具，關於管理電影事業上，之組織均有一強有力之統制機關。我國電影事業雖不能與歐美各國相頡頏，然對管理電影事業之組織，在本黨統制之下，不得不謀設立一中心組織，以期一方面負起領導國內電影事業之責，他方面復可充分表現其自身之力。<sup>5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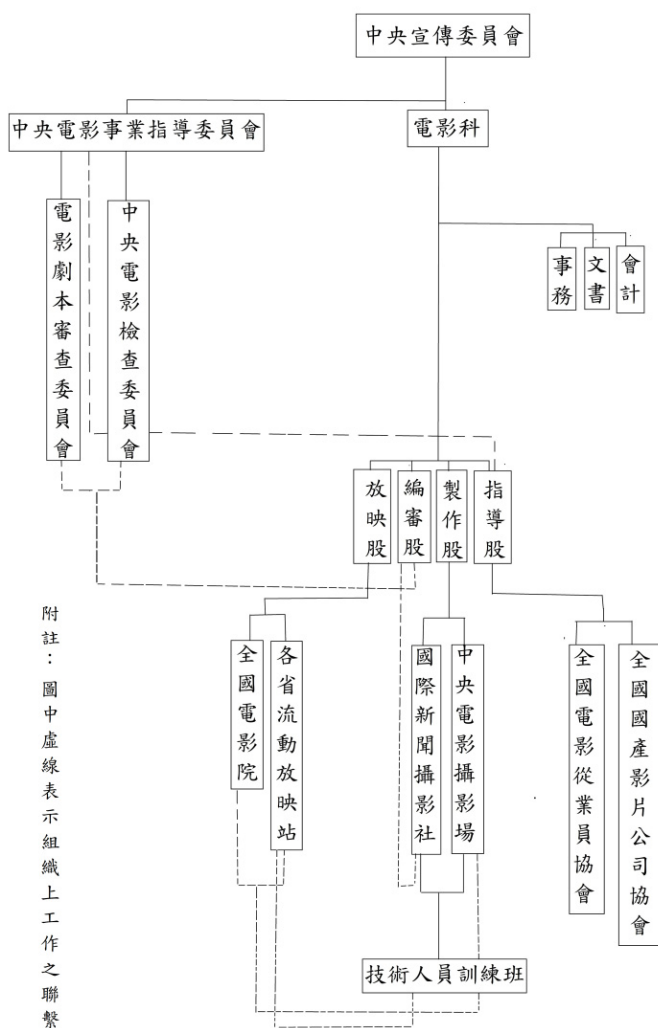
過去中國電影工作彼此各自為政，沒有一個統一機構管理，因此有此次的改組。至此，國內電影事業組織逐漸成熟，其組織架構如下表：

---

<sup>50</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擬升任張冲為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科科長案〉(1935年04月10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4.3/186.24。

<sup>51</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為增進電影工作效能擬改對電影股為電影科案〉(1934年12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4.2/34.24。

中國國民黨電影事業組織架構表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為增進電影工作效能擬改對電影股為電影科案〉(1934年12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4.2/34.24。

對於如何讓電影科組織更加完善，張冲提到未來工作主要針對四個方面：「(一)設電影場攝製中國所需的影片；(二)指導中國電影教育；(三)聯絡檢查；(四)放映部，將影片由城市普及到鄉村，使四萬萬國民都能夠受到相當的教育。」<sup>52</sup>1935年5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杭州召開第四屆年會，會議期間張冲被選為理事，並被推選任設計組副主任一職。<sup>53</sup>至此，張冲可以說是全面接手掌管中國電影事業，許多攸關電影發展的機構，皆有張冲的參與。11月12日至22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會中選舉出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與候補委員等人。<sup>54</sup>選舉結果陳立夫票數最高，但他竟比蔣介石多出一票，這讓陳立夫憂喜萬分，喜的是自己在黨內地位之穩固，而憂的是功高震主會讓自己陷於不利之境，於是在選舉結果公布前，偷偷命人減去自己一票加在蔣介石名下。<sup>55</sup>但此次的選舉CC派可謂是大勝，讓在黨內資歷不高，且年僅三十出頭的張冲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就連國民黨內頗具威望的宋慶齡也僅得到候補委員資格。<sup>56</sup>據張冲下屬張國棟的回憶：

蔣介石出於政治原因，企圖拉攏某一些不屬於他嫡系的軍政頭目獲得中委席位，哪知開票揭曉，竟落了選，蔣介石大為震怒，把陳立夫痛罵一頓，並命令駱美奐、張冲等數人以“讓賢”為名，將中委一席自動讓出，由蔣指定某幾個人接替。張冲消息靈通，知道後連夜搭車去上海，隱蔽起來，讓人一時沒能找到他，翌晨駱美奐便為蔣介石召去，當面令他讓賢，並允諾在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定能當上中委。駱等人出於無奈，只好遵命照辦。幾天後，風頭過去，張冲裝著不知道這回事的樣子，返回

<sup>52</sup> 「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科科長張冲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四屆年會上的致詞」(1935年5月5日)，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四屆年會專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5年)，9。

<sup>53</sup> 郭有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一年來會務述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53。

<sup>54</sup>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4)，113。

<sup>55</sup> 張文(張國棟)，〈為國共第二次合作作出重大貢獻的張冲先生〉，《南京文史集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13-14。

<sup>56</sup>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117-119。

南京。從此，張在政治上更為活躍。<sup>57</sup>

從這可以看出張冲的政治企圖與野心，他在陳果夫與陳立夫兩兄弟的提拔與協助之下仕途順遂，由此也能顯現出二陳對張冲的期望與重視。

## 五、中國電影走出國門

1935年2月，蘇聯電影工作者俱樂部為紀念蘇聯電影國有化十五週年，在莫斯科舉行國際電影節，同時邀請世界各國參與此次盛典，共有三十一國家的代表和影片參加，中國也在應邀國家之列。<sup>58</sup>在蘇聯當局發給南京的電報中，特別指名請胡蝶務必出席。據胡蝶自己的回憶：

當時在莫斯科中國駐蘇大使館工作的記者戈公振先生告訴我，在發出邀請電前，蘇聯文化當局曾向戈公振先生詢問中國電影事業發展情況，有無電影明星。戈公振先生答稱：「胡蝶是當今中國最紅的影星，在新加坡等地都有她的電影觀眾，東南亞的影業同行都來中國訂她的影片呢！」<sup>59</sup>

此時負責電影事業的張冲，自然不會放棄此次機會來宣傳中國電影發展，加上也為了彌補1934年米蘭國際影展，因中國送展影片晚到，而未能如期參賽的遺憾。<sup>60</sup>另一方面，此次蘇聯國際影展，對中國電影圈內人來說，「有機會到蘇聯及歐洲去考察一下外國電影事業，以提高中國電影水準，自是影業人員神往之事。」<sup>61</sup>因名額有限，在挑選人員方面費了一番功夫，代表團成員主要是由電影股工作人員挑選，及其他一些國內著名演員、導演與

<sup>57</sup> 張文(張國棟)，〈為國共第二次合作作出重大貢獻的張冲先生〉，《南京文史集萃》，14。

<sup>58</sup> 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第1卷，337-338。

<sup>59</sup> 胡蝶，《胡蝶回憶錄》(臺北：聯合報社，1986)，112。

<sup>60</sup> 1934年在義大利舉辦米蘭國際影展，中國獲邀參加，對此張冲曾與郭有守商議，選擇了聯華公司出品的「城市之夜」、「都會早晨」、「摩登三女性」三部影片，代表中國參展。然而影片送到時，影展已經結束，未能參展，最後決定在羅馬影廳撥放，雖未能獲獎，但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國外放映。郭有守，〈二十二年之國產電影〉，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北京市市屬市管高校電影學研究創新團隊整理，《中國電影年鑒1934年(影印本)》，188。

<sup>61</sup> 胡蝶，《胡蝶回憶錄》，112。

編劇等人。<sup>62</sup>張冲選派大學同學孫桂籍擔任該團秘書，負責俄文翻譯工作，同時也找了在電影股工作的顏鶴鳴一同前往。<sup>63</sup>在出發前，張冲特別囑咐顏鶴鳴，讓他學習蘇聯的攝影、製片和錄音等技術，據顏鶴鳴的回憶表示：

我到莫斯科是當時中國駐蘇大使的姪子顏永生陪我，坐了大使館的小車，到蘇聯各電影公司參觀學習。當時蘇聯解放不久，攝影場大多是利用舊教堂改建成的，蘇聯的導演和技術人員，知道我是張冲介紹去的，對我十分熱情，毫無保留地介紹蘇聯和當時各國電影事業的先進技術。<sup>64</sup>

國民黨中央相當重視此次國際電影節，認為中國能夠受邀參加，「對於我國電影事業，在國際間蓋已獲有相當地位」，故特撥款一萬元以資其旅費。<sup>65</sup>胡蝶一行人臨行前曾到南京「有所請示」，2月7日中午由中宣會主任邵元冲、副主任羅家倫出面在南京中央飯店款待他們，張道藩、褚民誼、方治與張冲等人皆出席作陪。晚間張冲又在南京擷英飯店設宴，再次宴請胡蝶等人，為他們送行。<sup>66</sup>「一日兩宴」，同時在南京當時最高檔的兩間餐廳設宴，又是政府高層出面款待，如此高規格的送行，在中國電影界可謂是不多見。代表團一行八人，前後分三批出發，隨行攜帶「大路」、「漁光曲」、「空谷蘭」、「春蠶」、「女人」、「桃李劫」、「重婚」與「姊妹花」等八部作品，扣除「姊妹花」其餘七部獲得「出國執照」<sup>67</sup>，其中以蔡楚生導演的「漁光曲」，在大會中獲得「榮譽獎」的殊榮，中國電影在國際初次啼鳴，就有此榮耀殊

<sup>62</sup> 朱開來，〈哭孫桂籍兄兼憶張淮南先生〉，《追思》（臺北：全台書城，1978），37。

<sup>63</sup> 朱開來，〈哭孫桂籍兄兼憶張淮南先生〉，《追思》，37；「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收入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9），149。

<sup>64</sup> 〈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收入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149-150。

<sup>65</sup> 葉楚傖等五委員，〈請補助周劍雲等赴歐考察電影事業旅費案〉（1935年5月21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4.3/191.21。

<sup>66</sup> 〈中宣會昨歡宴赴俄參加影展代表〉，《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2月8日，第1張第2版。

<sup>67</sup> 「第三十七次委員會議紀錄」（1935年2月9日），《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2.2（1935年3月1日），72。



為不易。<sup>68</sup>獲獎消息立即傳回國內，在中央社3月2日的電報提到：「國際電影展覽會，今晚在列寧廳舉行閉幕式，主席蘇密德斯基，給中國漁光曲以榮譽狀，因該片大膽地描寫現狀，且具有高尚的情調也。」<sup>69</sup>隨後，在3月5日中國駐蘇大使館發電向行政院報告此次國際電影展情況，稱：

電影展覽會於二日晚舉行閉幕式，到會千餘人，當場宣布評判結果，並發獎品。計第一獎屬蘇聯、第二獎法國、第三獎美國，第四名以後無獎，只發獎憑，中國漁光曲列第九名，在英、義、日、波之前。我國陶伯遜君受憑時，會眾鼓掌歡呼，甚為熱烈。此次參加展覽者廿一國，到會代表八十餘人，所攜影片近百，得與映演者，僅廿餘。我國影片得此獎譽，不可謂非意外。報紙評論，亦頗獎飾。惟音樂幼稚，一致駭詫。尤以映演時正常悲哀之際，忽雜以跳舞音樂，觀眾為之軒渠不止。<sup>70</sup>

結束後代表團分批陸續返國，張冲為他們舉行歡迎茶會，受到了國內媒體高度關注，報導提到：

黃謙，余英，顏鶴鳴，孫桂藉諸代表亦返，聯華又於新雅舉行茶會，列席者有中央攝影場場長張冲等，主人則為陶伯遜，吳邦藩，黎民偉三人。席間余，黃，孫，顏四君先後報告出席蘇俄影展情形，多所發揮。四君在蘇俄悉心觀察，該地輿論有「中國代表又青年，又好發問」之評語。又胡蝶因儀態雍容，舉止大方，在蘇俄備受歡迎，每至一處，掌聲隨之。<sup>71</sup>

代表團中，以胡蝶最受國際媒體關注，她利用此次出訪機會，順便赴歐洲各國考察當地電影事業，同行尚有周劍雲夫婦，一行人在各處公映隨身所攜帶國產影片，致力國際宣傳。「公映國產影片，影響所及，足以正友邦之視聽，免為反宣傳者所蒙蔽」，於是政府又特撥三千元贊助胡蝶等人考

<sup>68</sup> 〈中宣會昨歡宴赴俄參加影展代表〉，《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2月8日，第1張第2版；胡蝶，《胡蝶回憶錄》，112-115。

<sup>69</sup> 〈緊要消息〉，《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3月5日，第3張第1版。

<sup>70</sup> 〈蘇聯國際影展會閉幕〉，《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3月7日，第1張第3版。

<sup>71</sup> 「第二批蘇俄影展歸國代表茶會」(1935年3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頁82。

察。<sup>72</sup>周劍雲夫婦與胡蝶在莫斯科時，曾發電報給所屬的明星電影公司，提到他們行程稱：「『空谷蘭』、『姊妹花』二片，在莫斯科、列寧堡二地公映多次，受電影協會作家協會電影界藝術家盛大歡迎，俄報一致讚美，公司與蝶皆得褒狀，劍等演詞，且收入影片。」<sup>73</sup>考察團行經法國時，又在巴黎播映由胡蝶主演的「空谷蘭」與「姊妹花」兩部影片，獲得當地民眾大力讚賞，要求復映達四次之多，讓中國電影藝術獲得國際間的好評。<sup>74</sup>胡蝶等一行人，在結束歐洲考察之旅後，於7月8日返抵上海，受到民眾熱烈歡迎，大批群眾前往獻花。<sup>75</sup>電影圈內將胡蝶此次出訪視為中國電影事業的一件大事，於是各大電影公司也派人前往迎接，表現出團結一致的精神。<sup>76</sup>是日下午，胡蝶所屬的明星電影公司為他們舉辦歡迎茶會，主辦人在開幕致詞稱，此次的出訪，「對中國國家及電影界所負之使命，極為重大，自非平常遊歷可同日而語，現君等考察歸國對我電影界貢獻必多。」<sup>77</sup>在這次歡迎茶會上，胡蝶說：

在歡迎會上，由周劍雲先生作了訪歐經過的講話，講話不斷為聽眾的掌聲所打斷，可見民眾的心理很關心這次歐洲的訪問，對於電影代表團的訪問成功感到由衷的高興。我也在歡迎會上作了講話，感謝大家對於我們的愛護之情。<sup>78</sup>

周劍雲則是談到幾點心得：

各國影片，一國有一國之色調風格，頗難相提並論。唯美國列電影為國

<sup>72</sup> 葉楚傖等五委員，〈請補助周劍雲等赴歐考察電影事業旅費案〉(1935年5月21日)，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4.3/191.21。

<sup>73</sup> 〈胡蝶、梅蘭芳在俄行動速寫〉(1935年4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 編，《影戲年鑒》，5。

<sup>74</sup> 〈胡蝶、周劍雲歸國誌盛〉(1935年7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 編，《影戲年鑒》，6。

<sup>75</sup> 〈胡蝶、周劍雲歸國誌盛〉(1935年7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 編，《影戲年鑒》，6。胡蝶後來回憶當天的情形說：「前來歡迎的還有我的父母親、弟弟、妹妹等，我的未婚夫潘有聲也乘私人轎車到達碼頭。現在還記得他那天穿了套米色西裝，戴著同色草帽，挽著我穿過一層又一層的人群，和親友們握手，和影迷們招呼並致謝，明星的巨幅的旗幟上書『歡迎本公司經理周劍雲先生伉儷暨胡蝶女士遊歐返國』，和鞭炮聲、歡呼聲匯成一片歡樂的海洋。」胡蝶，《胡蝶回憶錄》，204-205。

<sup>76</sup> 胡蝶，《胡蝶回憶錄》，204。

<sup>77</sup> 〈胡蝶、周劍雲歸國誌盛〉(1935年7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 編，《影戲年鑒》，7。

<sup>78</sup> 胡蝶，《胡蝶回憶錄》，205。

內第四大企業，故對於電影事業，特別發達，其他如德國亦在猛進中，法國、俄國等均頗努力，蘇聯於過去之出品，均富有濃烈之教育化，現則有時亦趨重純粹娛樂藝術化。

最後他也語重心長地提到，國際間對中國電影的看法，認為「演員頗有學識經驗，導演稍差，音樂太幼稚，內景不如外景，收音甚佳，但遠近輕重尚須注意，總之中國有此程度殊屬可驚」。胡蝶的一舉一動一直都受到國人關注，報導寫到胡蝶這次的講話，「口才較前流利，語頗謙辭，對於參觀各國影片公司，深得借鏡，將來國片大可取法，且外人對中國電影，頗有好感，將來必有發展可能。」<sup>79</sup>胡蝶後來在她的回憶錄中，用了大量篇幅來闡述此次的遊歐經歷，可見得這次旅程在其內心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份量。7月16日晚間，張冲與陳立夫、張道藩、周佛海、郭有守、杜月笙等社會名流共47人，偕同20家企業公司聯名發起歡迎胡蝶等人的隆重晚宴，在《申報》刊登大標題公告，稱：

周劍雲先生伉儷暨胡蝶女士，前為赴歐參加俄、德兩國國際電影展覽大會，代表出國閱時半載近始回。滬此行兼歷英、法、瑞、義諸國考察電影，宣揚國片，國際盛譽收穫良多，非僅有俾影業尤足為國增輝。<sup>80</sup>

張冲在陸續接待幾批從蘇聯國際電影展回國的人員時，針對此次他們提出中國電影現今問題時，做出回應，並允諾政府將全力支持電影事業發展，席間曾表示：

蘇聯電影藝術雖不高明，惟對於研究提倡之精神，則貴可畏，並信將來蘇俄必有雄執全球牛耳之一日，所以中央亦極頗盡力幫助中國之電影業，並云此次返京，一星期當再來申，招集電影業，凡電影公司之有困難情形，而須互助者，以儘量提出，共同討論，中央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幫助云。<sup>81</sup>

就在張冲宴請胡蝶等人的當晚，也就是7月16日，明星電影公司創辦人之

<sup>79</sup> 〈胡蝶、周劍雲歸國誌盛〉(1935年7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6-7。

<sup>80</sup> 〈歡迎參加俄德國際電展大會代表周劍雲先生伉儷暨胡蝶女士回國舉行茶會〉，《申報》(上海)，1935年7月15日，第2張第7版。

<sup>81</sup> 〈張冲允助電影界〉(1935年4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頁178。

一鄭正秋因心臟病發驟然離世，此消息震驚電影圈，全國各界皆表示哀悼之意。<sup>82</sup>張冲也對此事感到惋惜，認為這讓中國電影事業痛失英才，讓中國電影界「頓失導師」<sup>83</sup>，因此在鄭正秋公祭之時，特電慰問家屬。<sup>84</sup>

## 六、「東亞之冠」攝影場

顏鶴鳴歸國後，給張冲遞交了一份考察報告，主要當時電影設備極為簡陋，只有兩架攝影機，是進口手提式的，製片工具則是手工操作，主要拍攝國民黨中央開會的新聞片，且都是無聲影片。<sup>85</sup>顏鶴鳴提到：「張冲的個性是忠厚耿直的，他當處長後，認為電影股範圍太小，應該發展。」<sup>86</sup>報告內容寫到：「南京風景區玄武湖進口處的小山坡那裡，很合適建造一座攝影場，就建議成立中央電影(有聲)攝影場。」<sup>87</sup>原先在南京江東門外的中央攝影場，「場址狹小，不敷使用」<sup>88</sup>，張冲在看了這份報告後十分贊成，於是即請求中央增加經費，著手開始建立國產電影事業的發展。張冲在1935年3月間，按照顏鶴鳴的建議，選址南京玄武湖附近建造一座有聲電影攝影場，交付顏鶴鳴全權負責，特別是技術和設備方面，囑咐「盡量物色當時國內各電影公司中，比較有實力的導演、演員、攝影師」，還要他將「把當時國外攝影製片方面先進的器材列出清單，以便進口。」<sup>89</sup>中央電影攝影場在南京、上海、北平三地招考演員，四百餘人報名應徵，最後通過初試審核

<sup>82</sup> 〈今日午後鄭正秋大殮〉，《申報》(上海)，1935年7月18日，第4張第13版。

<sup>83</sup> 〈電影檢查委員會張冲、方治電〉(1935年7月17日)，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頁3。

<sup>84</sup> 〈今日午後鄭正秋大殮〉，《申報》(上海)，1935年7月18日，第4張第13版。

<sup>85</sup> 〈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收入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148。

<sup>86</sup> 〈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收入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148。

<sup>87</sup> 〈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收入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148。

<sup>88</sup> 〈狂風施威中央攝影場倒塌釀慘案〉(1935年7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185。

<sup>89</sup> 〈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收入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150。

者僅 15 人，競爭可謂相當激烈。<sup>90</sup>此外在精心籌備之下，中央電影攝影場新址於 7 月 15 日完工。當天，參加開幕式的政商名流雲集，到場者約五百餘人。首先由國民黨中宣會主委葉楚傖致詞中提到，新的攝影場落成後應朝向四個方向努力，即：

- 一、中央攝影場與民營影場一樣，應接受電影指導委員會指導。
- 二、對中央各院部會及全國各機關委託攝製各項影片，應儘量效力。
- 三、與國內影業界取切實聯絡合作，俾共負發展影業責任。
- 四、本場同人於技術上應刻苦研究，於品格上應充分修養，俾能樹立影界良好風紀。<sup>91</sup>

葉楚傖講完後，由兼任該場場長的張冲發表報告：

本場係於本年三月初開始興建，歷時不及四個月而完成，所費建築費及一切配件，共計四萬元，並購置最新有聲攝影機二具，無聲機四部，五千枝光，燈光共計六十餘枝，亦值四萬元，兩種資產共八萬元。俱係前廠長黃英同志在開支中所節餘，及中宣會經費內節省所集之款。而今蔚為大觀，其設備完全，堪為東亞唯一影場。<sup>92</sup>

為使這個東亞第一的攝影場發揮最大效能，張冲替此規畫未來藍圖，打算「於六個月內，攝製新聞片三十餘部、生產建設片十二部、劇片兩部，將來映放地點，決側重於各內地鄉村，俾得收促進教育文化之速效。預計將來放映處，可有百餘處，散佈於全國。」<sup>93</sup>如此不僅可以促進電影事業與文化教育之間的聯繫，更期待能使國產電影在東亞市場占有一席之地。<sup>94</sup>中央電影攝製場設置之初，就直屬於電影股所管轄，其工作範圍主要有兩項：「一、攝製本黨所需要之各種影片，以建樹純正的電影作風；二、搜集電影技術人才，訓練成為本黨的電影專家。」<sup>95</sup>出品計畫則有：「一、新聞片每月出

<sup>90</sup> 〈中央攝影場考試演員〉(1935年5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 編，《影戲年鑒》，81。

<sup>91</sup> 〈中央有聲攝影場昨日舉行落成禮〉，《申報》(上海)，1935年7月16日，第2張第9版。

<sup>92</sup> 〈中央有聲攝影場昨日舉行落成禮〉，《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7月16日，第2張第3版。

<sup>93</sup> 〈中央有聲攝影場昨日舉行落成禮〉，《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7月16日，第2張第3版。

<sup>94</sup> 〈中央有聲攝影場建築費僅三萬餘〉，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 編，《影戲年鑒》，42。

<sup>95</sup>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編、北京市市屬市管高校電

片最少三本；二、教育片全年最少出片四套；三、戲劇片全年最少出片二套。」<sup>96</sup>作為國民黨的重要宣傳機構，替黨喉舌就成為其主要任務，除拍攝新聞影片外，基於政治需要也會拍攝一些對國內外宣傳的教育影片，許多反共戲劇或紀錄片，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國內重大的活動或慶典，也是中央電影攝製場專注的焦點，例如在 1935 年 11 月 25 日，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準備由青海返藏，南京政府特派員赴青海陪同班禪一同入藏，張冲鑒於「藏地遠處邊陲，交通不便，致內地民眾，對於藏地一切情形，均異常隔膜，故特派該場攝影師黎錫勳等，隨行入藏，沿途往返，攝製影片，將藏地風俗習慣、名勝風景、政治建設等攝入。」<sup>97</sup>這類紀錄影片，不僅可以讓國人了解中國各地人物風景，更將這些歷史畫面的珍貴鏡頭記錄下來。此外，為加強國人的愛國心，張冲也籌劃拍攝大型戰爭片，於是就有了「戰士」的出品。這部影片於 1936 年 4 月 24 日正式上映，是中國第一部有聲革命戰爭片，由余仲英導演，顏鶴鳴擔任攝影，影片內容是「紀革命軍抗敵之慷慨激昂！寫我先烈就義之奮鬥犧牲！」<sup>98</sup>以國軍北伐為故事背景，在報紙宣傳廣告上稱：「本片在未公映前，早已轟傳遐邇，毋庸吹噓。」<sup>99</sup>拍攝用意主要是喚醒國人對政府的信心，也宣傳國軍為人民福祉而犧牲奉獻的精神，這是一般民營電影公司較少涉及的拍攝領域。

## 七、張冲對中國電影教育的規劃

張冲除用實際行動來發展中國電影事業之外，同時也大量發表文章來宣傳其電影政策與闡述其對於電影發展的理想。對於電影張冲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與見解，他表示電影是科學和藝術的結晶，它不但能把觀眾在一般生活中感受不到的東西，用藝術形式去表達，更能將人生與社會百態如實

---

影學研究創新團隊整理，《中國電影年鑒1934年(影印本)》，565。

<sup>96</sup>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北京市市屬市管高校電影學研究創新團隊整理，《中國電影年鑒1934年(影印本)》，565。

<sup>97</sup> 〈中央攝影場派員赴西藏派攝影片〉，《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11月26日，第2張第3版。

<sup>98</sup> 〈中國第一部有聲革命戰爭片〉，《申報》(上海)，1936年4月24日，本埠增刊第6版。

<sup>99</sup> 〈中國第一部有聲革命戰爭片〉，《申報》(上海)，1936年4月24日，本埠增刊第6版。

呈現在大銀幕中，帶給人們感官中的震撼與刺激。<sup>100</sup>同時，張冲也提到「電影是一種工業，也是一種藝術，並且也是一種教育。」<sup>101</sup>就工業層面來說，1930年代電影工業占美國七大工業中的第四位，而美國更執世界電影之牛耳，事業發達國家也積極地提倡本國電影工業。而電影的藝術價值，張冲認為：「電影是綜合的藝術，包括一切文藝繪畫雕塑舞蹈戲劇音樂等等，每一種的藝術是人類文化的結晶，值得後代的人類發揚光大，這樣綜合的藝術更有值得注意提倡的必要。」<sup>102</sup>電影能涵蓋多方面的藝術，並將其完整的、系統的保留下來，對此也就能更突顯的電影價值所在。此外，張冲更積極介紹蘇聯電影事業，希望藉此作為中國效法借鏡對的對象。1935年，正值蘇聯電影業十五週年紀念日，斯大林對此特別強調，電影是「具有從精神上影響群眾的特別巨大的可能性，組織群眾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戰鬥力。」<sup>103</sup>由此可看出，蘇聯對於電影事業的重視，而張冲更是特別撰文，來表示他對於蘇聯電影事業推崇，強調「蘇俄電影，傾心經營，十五年於茲，其成果之偉大，殊出人意料之外。」<sup>104</sup>對此，張冲作一仔細分析：

蘇聯各種事業之建設，因其特殊之「政治形態」，自始即充分含有「統制性」，「計畫性」；對電影事業各部門，如電影工業，電影教育，發行，與放映各方面，皆有通盤計畫。此所以能於最短期內，收穫最大之效果也。<sup>105</sup>

蘇聯之電影事業，主要都掌握在國家手中，加上為方便統一管理，設立直轄於蘇聯人民委員會的「電影照相事業總管理局」。<sup>106</sup>張冲對蘇聯整體電影事業組織，有一完整性的認識與了解，藉此參考其模式，用以發展中國電影事業。在電影教育方面，他談到：

<sup>100</sup> 張冲，〈中國教育電影的使命〉，《教與學》1.8(1936.02): 57。

<sup>101</sup> 張冲，〈國產電影的重要與責任〉，《西北電影》創刊號(1935.12): 無頁碼。

<sup>102</sup> 張冲，〈國產電影的重要與責任〉，《西北電影》: 無頁碼。

<sup>103</sup> 斯大林，〈致蘇聯電影管理總局舒米亞茨基同志〉(1935年1月11日)，《斯大林文選》，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0。

<sup>104</sup> 張冲，〈蘇聯之電影事業〉，《中國與蘇俄》2.1(1935.10): 1。

<sup>105</sup> 張冲，〈蘇聯之電影事業〉，《中國與蘇俄》: 1。

<sup>106</sup> 張冲，〈蘇聯之電影事業〉，《中國與蘇俄》: 4。

電影所表演的是人生的各方面，影片的內容和中心意識具有偉大的力量，小則影響個人的身心，大則有關社會的安甯，因為電影本身實在是一種社會教育，它的功效可以灌輸智識，傳達政令，移風易俗，並且還可以輔助學校教育的不足，救濟教科書圖畫標本和儀器的缺點。<sup>107</sup>

另外，他認為電影教育的意義有廣義和狹義的分別，以廣義來說：「凡是一切的電影，尤其是在戲院映演的娛樂影片或戲劇影片都含著教育性質。站在社會教育的立場上說，無論戲劇、說書、電影，都能使觀眾和聽眾從娛樂中不知不覺受到一種教育上的影響」。就狹義而言：「凡是學校教學片、宣傳片、新聞片以及體育會生等影片，都是純粹的教育影片」。<sup>108</sup>特別在 1930 年代初期，全球正面臨著經濟大蕭條，在不景氣影響之下，世界各國仍積極著培植本國電影產業發展，為了強盛他們的民族，為了改善他們的教育，為了配合他們政策順利地推行，於是他們製造本國所需要的影片在全國各地放映。同時，再將這些影片推展到其他國家或地區裡，成為一種文化的侵略。當時中國是受到壓迫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對此張冲呼籲強烈國人努力投資國產電影產業，改進攝製影片的技術，培植影界人才，如此能才真正使國家富強，民族復興。<sup>109</sup>

## 八、結語

隨著中日關係的日趨緊張，中蘇兩國趨向和解，此刻的中共歷經過長征，到達了陝北。國際環境局勢的改變之下，張冲人生又歷經到一次重大的變革，再度邁向另一個階段。1935 年 11 月，張冲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擠身到權力核心，蔣介石開始讓他接觸與共黨的談判問題。至此，張冲成為蔣介石處理對蘇關係與中共問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同時張冲也是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得力助手，在兩陳的幫助下，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張冲從特務情報轉入電影宣傳體系後，便積極的從事反共宣傳教育，希望將政

<sup>107</sup> 張冲，〈國產電影的重要與責任〉，《西北電影》：無頁碼。

<sup>108</sup> 張冲，〈中國教育電影的使命〉，《教與學》：57-58。

<sup>109</sup> 張冲，〈國產電影的重要與責任〉，《西北電影》：無頁碼。



# airiti

府施政理念傳達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總體而言，張冲主掌中國電影事業的時間不算長，但在他的任期中，中國電影走出國門，迎向國際，為中國電影發展奠定了一個新的篇章。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

1.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126-035、002-080200-00201-131。
2.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1281A。
3. 《會議記錄》，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3.3/168.8、會4.2/34.24、會4.3/186.24、會5.2/10.10、會4.3/191.21。

### (二) 史料彙編·公報

1. 《南京文史集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2. 《樂清文史資料》，第4輯，樂清：樂清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
3. 「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羅剛呈中央宣傳委員會為清查神怪禁片及擬定處置辦法呈文」(1935年1月17日)，《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2.1(1935.02): 4-6。
4. 「第三十七次委員會議紀錄」(1935年2月9日)，《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2.2(1935.03): 71-72。
5. 秦孝儀 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6. 盧夢殊 編，《電影與文藝(銀星號外)》，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1928。

### (三) 年鑑

1. 上海電聲週刊社 編，《影戲年鑒》，上海：上海電聲週刊社，1936。
2.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編、北京市市屬市管高校電影學研究創新團隊整理，《中國電影年鑒1934年(影印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

### (四) 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文選》，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
2. 朱開來，《追思》臺北：全台書城，1978。

3. 胡蝶，《胡蝶回憶錄》，臺北：聯合報社，1986。
4.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
5. 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主編，《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臺北：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9。

### (五) 專著

1.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念冊》，上海：中國文化建設協會，1937。
2.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電影事業之出路》，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3.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
4.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 編印，《二十一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5.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 編印，《二十二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4。
6.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 編印，《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三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
7.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北京：華文出版社，2015。
8. 司馬芬，《中國電影五十年》，臺北：皇鼎文化出版社，1983。
9. 杜雲之，《中國電影史》，全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10. 汪朝光，《影藝的政治——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11. 洪深，《電影界的新生活》，南京：正中書局，1934。
12. 徐耀新 主編，《南京文化志》，全2冊，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3。
13. 張冲、張北海、羅榮濂、許紹棣，《意德土訪問錄》，上冊，南京：正中書局，1935。
14. 陳立夫 講述、王平陵 筆記，《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15. 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9。
16. 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全2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
17. 褚民誼，《利用電影促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及輔助各種事業之進行》，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18. 劉維開 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4。

19. 薩爾地，《電影與中國》，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 (六) 期刊·論文

1. 〈短訊：張冲大宴顧問先生〉，《影画》1.19(1934.12): 434。
2. 方治，〈與果夫先生的奇遇及其他〉，《傳記文學》29.3(1976.09): 26-28。
3. 朱開來，〈悲劇時代英雄：神秘人物張冲(一)〉，《中外雜誌》42.5(1987.11): 106-110。
4. 泊泊，〈張冲宴請電影界希望外片絕跡於國內〉，《電聲(上海)》3.47(1934.09): 931。
5. 孫健三，〈開啟中國電影史與中國電影教育史絢麗寶庫的第一號鑰匙〉，《北京電影學院學報》Z1(2015.10): 66-68。
6. 張冲，〈中國教育電影的使命〉，《教與學》1.8(1936.02): 57-59。
7. 張冲，〈國產電影的重要與責任〉，《西北電影》創刊號(1935.12): 無頁碼。
8. 張冲，〈蘇聯之電影事業〉，《中國與蘇俄》2.1(1935.10): 1-7。
9. 張冲講述、以防記錄，〈意德印象的一班〉，《晨熹旬刊》創刊號(1935.01): 8-11。
10. 塞燕，〈電影簡史〉，《時代電影》2.6(1937.05): 24-25。

### (七) 報紙

1. 〈中央有聲攝影場昨日舉行落成禮〉，《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7月16日，2張3版。
2. 〈中央有聲攝影場昨日舉行落成禮〉，《申報》(上海)，1935年7月16日，2張9版。
3. 〈中央攝影場派員赴西藏派攝影片〉，《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11月26日，2張3版。
4. 〈中宣會昨歡宴赴俄參加影展代表〉，《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2月8日，1張2版。
5. 〈中國第一部有聲革命戰爭片〉，《申報》(上海)，1936年4月24日，本埠增刊6版。
6. 〈今日午後鄭正秋大殮〉，《申報》(上海)，1935年7月18日，4張13版。
7. 〈緊要消息〉，《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3月5日，3張1版。
8. 〈蘇聯國際影展會閉幕〉，《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3月7日，1張3版。
9. 〈歡迎參加俄德國際電展大會代表周劍雲先生伉儷暨胡蝶女士回國舉行茶

# airiti

張冲與國民黨電影宣傳事業(1934-1936)

· 29 ·

會〉，《申報》(上海)，1935年7月15日，2張7版。

## **The Contribution “of” KMT Film “with” Zhang Chong (1934-1936)**

Lin, Wei-Jie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 an art, the fil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t the very beginning, which mean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is synchronized with the world. The effect of the film is comprehensive, including food, clothing,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all contact with the film. At the same way, for the reason to rule and against the leftist film of CCP, Kuomintang government engaged in film education actively in 1930, which made Zhang Chong became an important role to inherited Chinese film. When Chen Guo Fu and Chen Li Fu were in charge of the KMT propaganda system that time, they strived to help Paul Zhang Chong into the film propaganda system, hop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film by using his specialty, further promote Chinese film industry, and also hoped to anti-communist with his identity of spy to suppress and prohibit the films which were disadvantageous to the authorities. Over all, Paul Zhang Chong presided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not a long time, but during his tenure, Chinese film did go international, let the world see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s of Chinese film.

**Keywords: Zhang Chong, Film Education, Hu Die, Song of the Fishermen**